



专心去造成中国自己的高等教育

——张彭春在清华学校（1923—1926）

○金富军（1994级物理）

1923年5月，曹云祥校长以张彭春“学问渊博，热心教育”邀请其任教务长，负责课程设计等工作。7月4日，张彭春到校视事。1926年2月，张彭春辞职离校，在清华担任教务长两年有半。

在清华期间，张彭春积极推进师生交流、改进过渡期内课程方案、设计大学部培养方案、推动向全国公开留学生选拔等。张彭春反对照搬西方教育模式，强调要融会中西教育之长“专心去造成中国自己的高等教育”。他的理念和实践对推动清华由学校向大学过渡起了重要作用，也对以后清华大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本文梳理张彭春在清华事功之荦荦大者，谨以纪念他诞辰130周年。

促进师生交流

清华自建校起，教学严谨、考试频繁、淘汰率高。在繁重学业压力下，学生疲于奔命：

清华学生，一年三百六十日，除放假外，均似在教习命令下讨生活。今天预备这范围，明天复习前面几节，这周有小考，下周有月考，一科如是，科科如是，而学生之几许时光，已被支配殆尽矣！一日出此堂，入彼堂，忙忙碌碌，疲于奔命。

另一方面，学生抱怨师生交流不足与不便：

清华师生交际现状，诚令人不满意。



1925—1926年，清华学校教务主任张彭春与同事合影，左起：朱敏章、余日宣、张彭春、何培元

除少数平常往来的教员和学生外，大部分都有下列几种现象：（甲）教员除在课堂里教书外，似乎与学生无关系。（乙）学生在课堂里对付教员外，平时怕见教员。（丙）师生俱荣会连合得太少。

1923年9月27日，张彭春在教员会议上表示：

本校现用学科制，好处固也不少，但是结果容易把教育看成分散的，不是统一的，所以教员和学生毫无联络。在教员方面，以为教完功课，就算责任已尽。在学生也以为读完功课，只要各学科分数及格，就称心满意。其实所谓真正的教育，岂止学科而已哉？本会议的目的：在使各科教员互相联络，某生英文程度如何？国文程度如何？算学程度如何？再调查各生对于作业之兴趣，然后定实地指导的方

法。每星期聚会三四次，想成绩必有可观也。

1923年秋季学期开始，张彭春排定教员分组会议下分国文等七个组。每个组定期开会，且开会前先期通知张彭春。教员会议主要讨论教材、教学法、教学进度、设备、新书、新著作、报告、专家演讲等。这样分级会议的目的“在使同级教员有所联络；对于一学生能知其各科学业之状况，而使便于引导”。

张彭春加强师生交流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借鉴美国大学通常设置的Open Office Hour制度，要求每位教师每周都要定出固定的时间和地点接见学生。张彭春的建议得到了教员的积极响应，48位教员每周安排固定时间、固定地点和学生见面。一般而言，教师每周安排两次见面，每次1小时。部分老师每周一次，但时间为2小时。也有部分教师延长见面时间，例如梅贻琦每周3小时；甚至有老师每周6小时。这一制度受到学生热烈欢迎。“今年诸位教员，每礼拜都有一定接见学生的时间，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了。”

这个制度让师生面对面交流，谈现实与理想、现状与未来、困惑与思考、个人与社会等多个话题，拉近了师生距离，增进了师生感情，潜移默化之中影响和教育了学生。

订立清华人才培养目标

建校初期，清华以“培植全才、增进国力”为宗旨，以“进德修业、自强不息”为方针。到1913年后，清华以“培植全才、增进国力”为宗旨，“以造成能考入美国大学与彼都人士受同等之教育为范围”。这种表述，与清华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性质相适应。但从长远看，仅满足于

培养合格留美人才显然不够。1923年秋，曹云祥坦陈：“清华之弱点，则为缺乏久远之教育方针，以为设施标准。”

1923年11月1日，张彭春在教职员会议上宣读课程委员会报告，明确提出“清华希望成一造就中国领袖人才之试验学校”。第一次明确了清华人才培养的目标。张彭春解释：

我们所希望造成的领袖，乃是比寻常人能做多而且好的工作的。他们的工作，是要特别的有效率。然而他们并不是超人，也不是混来一个洋翰林的头衔并侈然自足的。

现在中国的高等教育完全是模仿外国。以为能办到与外国高等教育同样的地步方算高等教育。但是中国人不是没有文化的民族。外国的高等教育，若不经一番改造，断不会在中国适用的。我们应当根本反对这种模仿的思想，专心去造成中国自己的高等教育。清华在今日教育界占有特别的地位。第一，清华不是完全的国立学校。制度上、办事上，很有自由伸缩之余地。第二，清华的经费比较别校略为丰富。所以这改造中国高等教育的试验，当然非清华担任不可。

这就是我们要清华作一个试验学校的意义。我们去担任领路的试验的责任，必须有两个根本的观念：一、我们的方法不必与中国或外国已有的方法相同；二、我们的办法又不可与国内的情形相去太远。否则我们试验的结果别人不能采取，那就太不经济了。

对清华明确提出办学目标，大受学生欢迎。11月1日张彭春报告甫一结束，即有学生高度评价这给清华发展指明了方向：

本学期自从张教务长任事以来，对于

本校学制、教育方针与计画诸点，均力求有具体的确定，所组织的课程委员会又能积极进行，……对于新课程的讨论，第一件竟能将教育方针确定为“造就领袖人才”，这是一件何等可贺的事情！从此清华学校犹如造了一个大指南针一样，无论教职员学生都知道向那一条道前进了！

1926年2月，张彭春辞职离校的时候，清华学生从五个方面高度评价张彭春的贡献，其中第二条即“建立新大学，完全以在中国造就本国领袖人才为目的，立清华永久之基”。

1927年，邱椿回顾清华16年发展，高度评价称赞：“清华的教育政策，就慢慢地从模仿时期，而达到创造的时期了。这真是清华的再生！清华的政策，是要建设纯粹中国式的大学。清华教育目标，是要养成中国式的领袖人才。这是何等事业！这是何等精神！”

负责过渡期内课程改革

1923年7月，张彭春到校。暑期过后，9月，学校组织了“课程委员会”，由张彭春、梅贻琦等人组成，筹划改办大学的一切具体步骤与措施。既包括对即将成立的大学部的课程方案，也包括已有留美预备部过渡期课程方案。

清华在1925年成立大学部之前，实行八年的长学制。“学文科的，到美国可以插大三，或大四；学实科的，有时可以插大二，有时还要进大一。”虽然清华借鉴美国学制在总体上适应了学生求学的需要，但也因此陷入“清华学校，以学制言，不中不

外；以课程言，非牛非马”“大学不是大学，中学不是中学”“学生程度，能插美校何级，尚不能知”的窘境。

与学制相连的是课程程度问题。学生到美国插班时的程度与在清华课程水平直接相关。由于某些美国大学并不了解清华课程实际程度，High School的毕业文凭又不能反映学生的实际水平。曾有美国大学教务人员发出“清华高等科程度能否与美国High School相敌，尚系问题”的疑问。清华学生联系插班时候，或者出示清华英文章程等反复恳切说明，或找在读中国学生协助解释说明。如果某校此前没有清华学生就读而又对清华学生程度有所疑问，那么第一个联系该校的学生就会遇到诸多障碍。对于不能插入高年级的学生，只能从低年级开始，重复学习在清华已经学过的内容，造成时间紧张。而对于不能出国同学，由于在校所受教育不是完全的大学教育，走向社会后，就业发生问题。学生对课程体系提出各种建议，例如提高算学



1923年，清华学校教师合影，前排左6为校长曹云祥，左7为教务长张彭春

程度、减少英文课时等。

张彭春负责设计全新的大学部课程方案的同时，也统筹设计过渡期内留美预备部的课程设计。针对这些实际问题，结合大学部成立需要增聘教师，他采取的措施是增加教师人数，在与原有课程衔接同时，提高自然科学程度。

1924年9月，张彭春谈本年教务方面改革：“本年最重要之改革即中文部之刷新。校长特聘比较多通新学之教师，庶几足以引起学生之兴趣。”“社会科学方面亦已增聘教授。清华正逐渐改为大学，故诸教授均知前程远大，虽能潜心研究，无五日京兆之心，是亦清华之福也。”

有学生比较张彭春主持制定的1925—1926年度课程与1924—1925年度课程，“其内容与今年课程无甚差别；惟钟点减少，科学提前，与国学各科稍微变动耳。”“来年之课程表，……其内容与去年大致相同，然有二特点，为以往课程所不及者。”“自然科学之又提高也。以往清华自然科学之肤浅，为中外所共认。高一始习平面几何，高三始习初级物理、化学。此种课程，既非取法乎英美，更不合中国部定之程度。”“近来课程大加改革，最显者即科学程度之提高。去年高三习化学、物理、生物，今年则高二已习之矣。明年则更进一步，高一矣有高中化学、物理、生物三科。进步之速，一日千里，此诚可为现在低级同学所庆贺者。”

张彭春对留美预备部课程的调整，客观上有利于课程难度提高，有利于毕业后插入美国大学较高年级。统计留美预备部学生进入美国大学年级信息，在课程改革以后，毕业生插入美国大学高年级的比例相对此前保持了较高比例。

负责设定大学部培养框架

1924年10月，清华学校“大学筹备委员会”成立，改办大学加速进行。具体程序是：“大学筹备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与分组会议。其中，分组会议包括课程及计划组、教职员待遇组、招考新生组、派美游学官费组等四组。分组会议的决议，提交联席会议，通过后，再提交大学筹备顾问，并呈报学校董事会，最后呈报外交部，批准后实施。以上各项会议外，最重要的是联席会议正式开会。

在联席会议下设的四个专项组中，张彭春负责课程及计划组。可以说，这个组是改办大学一揽子方案中最核心的内容，讨论事项有：（一）教育方针宜造就何种人才，（二）应设科目，（三）大学课程，（四）校舍与设备。

1925年4月，外交部批准了大学筹备委员会提出的《清华大学工作及组织纲要（草案）》。学校随即按照《纲要》成立了“临时校务委员会”，由曹云祥、张彭春等10人为委员。临时校务委员会负责将清华学校改组为大学部、留美预备部和研究院三部分，并决定到1929年旧制生全部毕业后，留美预备部停办。

1925年5月，大学部正式成立，开始招生。大学部“以在国内造就今日需用之人才为目的，不为出洋游学之预备”。张彭春设计的大学部分为普通与专门两科。张彭春任留美预备部主任兼普通科主任，负责制定普通科课程方案。专门科具体课程则在专门科主任庄泽宣领导下制定。

张彭春留学美国，对美国高等教育有较深了解。但在教育理念上，他主张中西融合，不迷信美国“制度”，注意吸取中

国传统教育中有益的内容。在设计大学部培养方案时，他注意贯彻通识教育理念，同时借鉴中国传统学徒制/书院制。普通科重在基础，专门科重在精深之研究。

1925年9月7日上午，张彭春对大学部普通科全体新生谈了培养理念。

（一）分班办法

分班办法，不以从前在学校之资格为准。前二、三星期之课，系甄别性质。第一年内之课，系试读性质。

（二）清华大学之教育方针

（1）现今高等教育之弊，为迷信“制度”。为学分制及自由选科制所缚束。其害约有数端：①师生隔膜，完全失去教育之真义。②性质机械——甚至按学分收学费，等于买卖。③不知学问之统系及联络，只得其片段。④虽有所谓Major System，然而不能专精，亦不能养成学者之创造能力。

（2）吾人所认为教育者，即一师一生间互相发生影响之谓。故清华大学重在人才不在制度。

清华大学普通训练之期望：①令学生有广阔坚实的基本知识，能了解现代之中国及其环境。②逐渐养成学生自行研究之能力。③令学生注意职业之选择，为适当预备之计划。

清华大学之专门训练，则完全采取个人指导制，令学生各就所选之门类，为自动的、专精的研究。同时要能知该门类全部之大意。专门训练之终，将有一最后试验，以试其知识及研究之能力。

清华之环境，在国内各校中，比较地实为良善。吾人若不及此暇豫，互相淬厉，以期有所成就，是太辜负

此良机矣。

应该说，西方教育制度有它先进的地方，西方近代以来的崛起和快速发展依赖于教育提供的强大的人力资源，这是无可讳言的事实。但不盲从、不迷信西方，而注意挖掘中国传统教育有价值的部分并自觉传承，也是张彭春文化自觉的体现。

大学部培养方案，“普通科为大学之前二年或三年，以使生知中国之已往与世界之现状，籍以明了中国在此过渡时代之意义，并鼓励学生使为择业之考虑为宗旨”，专门科为“已选就终身职业或学科之学生，作专精之预备”。

“普通训练为期两年或三年；专门训练之期限视其门类之性质而定，亦约为两年或两年以上。”普通科不分系，教学上“重综合的观察”，即学习一些普通的基础课程，学习期满后由学校发给修业证书与成绩单，“学生或入本校所设之各项专门训练，或转学他校，或出外就事，一听其便。”专门科基础与理论、研究与实践并重，分三类：1.文理类；2.应用社会科学类，如商业、新闻业、教育及法政等；3.应用自然科学类，如农业、工程等。学



1924年泰戈尔访问清华，第一排从左往右依次为王文显、张歆海、徐志摩、张彭春，第二排为辜鸿铭与泰戈尔，第三排右为曹云祥校长

生成绩合格后，发给毕业证书与学位证书。普通科学生如愿意继续升入本校专门科，需要经过一次入学考试。

张彭春设计的这个分阶段培养计划，充分体现了通识教育的理念。但也存在不足，那就是普通科培养目标不明确，与国内一般大学不相衔接，学生反映普通科“不文不理”，年限又太长，学了没用又无兴趣。同时，普通科不能直升研究科，相当于大学期间还有一次淘汰，这与其他大学迥异。张彭春辞职后，清华取消了普通科，设立17个学系，规定“大学部本科修业期至少四年，学生毕业后给予学士学位。”大学部改成四年一贯制正规大学。

虽然张彭春设计这种培养方案遭遇重大挫折，但重视通识教育仍有其价值。正如图书馆主任戴志骞评价：“张先生很忠实，有主见，有才能，其大学计画于事实上虽未必尽善，但颇合教育原理。”

张彭春设计的方案也为以后清华大学的培养方案设定开辟了先声。1931年梅贻琦任校长后，坚持“通识为本、专识为末”的理念，1933年秋季以后，大一新生不再分系，规定大一学生需经过数、理、化等课程的甄别考试，并在及格后，方准选习“微积分”“普通物理”和“普通化学”。同时，到第二年选系时，学生又受到入系的特殊限制。这表明，有相当多的系对学生做了二次挑选。这样做保证了学生的业务质量，也使得部分系只有少量学生。可以说，国立清华大学的教学方案吸收了张彭春当初设计的方案的合理因素。

推动公开留学生选拔

伴随着清华学校改办大学不断推进，一个现实的问题随之而来。留美预备部不

再招生，在校学生按照旧章毕业即可赴美留学，1929年最后一届学生毕业后留美预备部自然终结。那么，大学部成立后新招的学生是否也要依此办理？如果不依照留美预备部，那么一校之内出现两种不同学生类型，课程体系判然有别姑且不论，学生毕业后待遇更是天壤之别。如何在过渡期内妥善处理，避免可能出现的两类学生之间的矛盾，是学校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对此问题，张彭春态度坚决、观点明确。他在1923年4月9日日记中写到：

（一）学校与派留美分清为两项事业；款项也应在预算内作两种算法。下五年内派留学欠款应由五年后留学项下出，不应干涉学校进行。

……

（三）派留学应公开考试，清华大学毕业生与他大学毕业生有同等报名投考的权利。现在在校生都应一律送美，从本年秋学生起，入学时写清志愿书时标的不出洋。

张彭春将改办大学、大学部招生及毕业与选派留学分开的观点，为解决清华改办大学及成立国学研究院，学生出现分化、留美预备部与大学部及国学研究院三部短期共存出现的问题提供了稳妥可行的思路和政策。

第三条面向全国公开考选留学生而非清华学生专享留学资格，这是张彭春对社会意见的吸纳。美国退还庚款溢款独用于清华而非普济全国教育，清华毕业生自动享受公费留美，不免引起有关教育公平的争议。与张彭春同时考取第二批直接留美生赴美的许先甲在1914年撰文指出：

“清华学生有应最后考试之资格；其他无论程度如何，举不得与，此事理之最不公者也。”1915年，胡明复提出：“第二次

出洋考试最为适当。凡有志出洋者皆应得预考，不问其为清华与否也；考而及格，即与出洋，不问其为清华与否也。”许先甲、胡明复本身即为庚款留美学生，他们的批评极有代表性。显然，张彭春同情并支持这些批评。

张彭春的这个意见为校长曹云祥接受，遂成为学校的方针。

1925年，学校聘请颜惠庆、王正廷和范源廉为专科女生考试评定员。同时，学校也评定通过了两年后专科生考试办法以及四年后留美考试办法。张彭春在1925年7月25日日记中记载了办法的主要内容：

一、二年后，男、女生各五名，都须大学毕业并一年以上作事经验。

二、四年后，共送二、三十人，公开考试，本校毕业与他校毕业同，并二年以上作事经验。男女合考，女生至少占全数三分之一。

接着，张彭春写了他对留美考试办法的理解：

按政策，留美考试必须于大学之外。选择方法很待研究。将来在美应入何科何校，也不应如现在这样没系统。选择标准与全国高教育有莫大关系。派送种类也不应只限一样。各承认大学教授，任职在三年或五年以上，有相当研究成绩及教授经验，每年可选派五人至十人。他们在外年限至多不过二年，并且他们任职大学及所派个人都须负相当供给之责，如学校出一年的半薪，个人筹旅费，或用别的方法鼓励学校及个人出相当代价。

面向全国公开留美机会，体现了教育机会的公平，也体现着将来学校性质的变化。1925年成立的大学部定位于“纯以在国内造就今日需用之人材为目的，不为出

洋游学之预备”“俟旧制学生毕业后，留美学额之给与以公开考试定之。全国各大学之毕业生均得投考”。这正是张彭春意见。揆诸1929年以后学校历史，虽有迁延，但这些政策还是得到了实施。

余 论

1926年2月，张彭春辞职离校。他在致校长曹云祥信中表示：“在清华两年有半之工作，有无价值，亦听诸当世明达之公判。不过始终彭未背其主张。故今日决然求去，似可告无罪于良知也。”

清华学生发起“挽张去恶”运动。学生在致董事会请愿信中高度评价：

张先生在清华之重大功绩：

关于校政者

一、主张学校与游学划分，实行停招旧制留美预备班，历年关于留洋之纠葛，一旦根本解决。

二、建立新大学，完全以在中国造就本国领袖人才为目的，立清华永久之基。

三、主张留学学额之给予，完全公之于全国各大学之毕业生，以公开考试定之。此议一出，全国各大学学生，均有游美深造之机会，外间攻击清华、忌妒清华之言论渐消。

四、提倡气节，以坚卓特立，不流俗为学生表率。

五、其言论操行无形中影响学生之思想行为者实深且厚，试细察清华年来校风之变迁不难了悉，非敢溢美也。

以上五端，万目共睹。即反对张先生者，亦莫能否认。总之生等此次之挽留张先生纯系为清华大局设想，为正谊公道求伸。众志所趋，如危崖转石，苟达目的，不惜牺牲。掬诚上陈，俾候毅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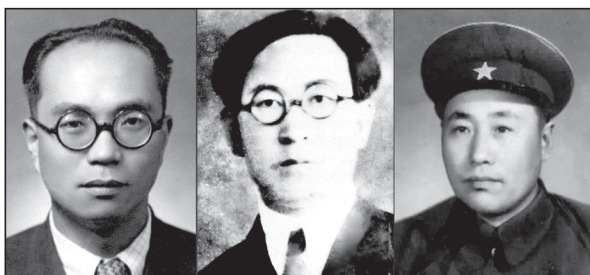
遗憾的是，虽有学生极力挽留，但张彭春坚决求去，离京回津。

学生对张彭春的感情是真挚的、持久的。1928年国民党北伐胜利，在接收清华之际，张彭春被学生校务改进委员会推荐为与戴季陶、邵力子、胡适、凌冰、周诒春、周鲠生等政界、学术界名人并列的校长人选。

长期以来，张彭春在清华校史上隐而不显，正契陈寅恪先生在王国维先生纪念碑文中所写的“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哲人其萎，思想永存。时移世易，张彭春关于中西教育的思考对今天仍不无价值。他对清华由学校向大学过渡作出的重要贡献，理应得到充分的挖掘和肯定。

东北抗联中的清华三杰

○袁 帆（1975级建工）



左起：冯仲云、张甲洲、于天放

在20世纪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坚持14年浴血奋战的“东北抗日联军”中涌现出杨靖宇、赵一曼、赵尚志等一大批民族英雄，而另有三位清华人也留下了光荣的名字，他们是：冯仲云、张甲洲、于天放。

一、他们因何没能拿到清华的毕业证书？

早期的清华学校虽然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但中共清华党支部早在1926年11月就开始建立。冯仲云、张甲洲、于天放分别于1926、1930、1928年考入清华，并先后成为清华早期共产党员群体之一员。

回望当时的历史大背景，成立还不到

十年的共产党，在经历了被国民党右派几近斩尽杀绝的至暗时刻，力量极其微弱，幸存的党员全部隐匿身份，转入地下工作。在当时的形势下，既要完成大学的学业，又要按照党组织的指示秘密地进行革命工作，清华的共产党员所要承受的风险可想而知。这也成为他们都没有拿到清华毕业证书的主要原因。

1. 1930年算学系唯一的肄业生“老冯”

冯仲云（1908—1968，江苏省武进县人）是1927年5月1日入党，在1928年1月担任了第六任清华党支部书记，还曾担任过中共北平市西郊区委委员。

非常难得的是，在1930年10月出版的《国立清华大学第二级毕业纪念册》中，印有一张冯仲云的毕业照，还有同学对他的评价，一位署名“丞”的同学这样写道：

“革命和恋爱”，这是时下一班青年的口号，我们的老冯从前也曾躲在房里偷偷地狂吻着“他的她”的来信和照相过。可是他现在却时常在喊着“恋爱这玩意儿，咱是不干了”。他虽不谈恋爱，可爱